



《外台秘要》： 古典医学文献的集大成者

□ 郑 洪



唐诗中有“盛象气象”之说。这一阶段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医学发展也成就赫然，约成书于天宝十一年（752年）的医学文献巨著《外台秘要》，就是具有时代气象的代表之作。

王焘与《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约670—755年），陕西眉县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王珪在唐太宗时曾任宰相。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开元年间他走上仕途，官至监察御史、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并进入弘文馆担任学士，天宝初年又升任为弘文馆主管官员。

弘文馆是唐朝宫中藏书之地，在唐太宗年间就“聚书二十余万卷”。王焘作为这一国家级藏书机构的总管，负有整理各类文献的职责，但是未见王焘有其他方面的著作传世，而只见到医学著作《外台秘要》。可见王焘在馆中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医学方面，他立心让更多人能全面系统地阅读到这些医学知识，于是耗费心血，编成这本40卷的巨著。书名中的“外台”，日本学者丹波元胤指出“兰台为外台之谓者也”，宫廷内的典籍收藏书库旧称“兰台”。书名体现了王焘著书立说的基础。

过于曾有一种说法，认为王焘本人不知医，仅仅是利用职务之便做了一些文献编集工作。事实上，王焘在《外台秘要》自序中说，他“幼多疾病，长好医术”，《新唐书》说他“数从高医游”，显然系统学习过医学。他后来受亲戚之累，被贬房陵、大宁郡等地时，屡冒暑湿瘴疠，全赖所收集的医方得以幸存，可见对运用医术也颇有造诣。《外台秘要》收录的文献有唐以前的“古方”五六十家，唐代新撰者“数千

百卷”，王焘说他全部“研其总领，核其指归”，就是说全部研究和考察过其主要学术思想，然后“矜其要妙”（约取其精华），反复修改，完成这本巨著。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深入的医理知识和一定的临床体验，是无法进行这项工作的。

总领铃要的分类编排

《外台秘要》的体例，具有类书的特点，即分门别类，辑集资料。“分门别类”并不简单，它包含着对医学知识体系的理解。《外台秘书》一书卷1—6为伤寒、天行、温病、疟疾、霍乱等；卷7—20为内科疾病；卷21—22为眼、耳、鼻、齿诸科疾病；卷23—30为外科疾病、痢疾等，后面各卷分别为采药、丸散、面部诸疾、妇人病、小儿病；卷37—38论乳石；卷39—40载明堂灸法。因为外感多为急病，是首要学习的内容；内科是外、妇、儿各科的基础，故依此排列。这种专科化的编排比较符合学习原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的临床医学教育体系。

在各个门类之内，《外台秘要》以病为纲，每种病先列医论，后列各家医方，每一条原文都注明出处。同一条文如见于多种文献的，也一一注明，甚至注明在何书的第几卷，可见其严谨性。《外台秘要》类目清楚，便于查阅，可称是我国第一部成熟的医学类书。

兼采博收的文献来源

《外台秘要》收录的既有唐代以前的“古”文献，也有唐初至天宝以前的最新文献。所采录的医书有的仍存世，但更多现已散佚，全赖此书才得以保存部分内容。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古书益多散佚，惟赖森

此编以存。”

《外台秘要》还收录了不少王焘所处时代的最新医学文献，包括一些名医进献于皇上的良方，均“采而录之”。唐前期名医辈出，《旧唐书》说“则天、中宗以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指张文仲、李虔纵、韦慈藏）为首”，作为三大名医之首的张文仲著有《随身备急方》，并曾受命向武则天进献“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但这位名医的著作未能传世，极为可惜。幸而在《外台秘要》中，王焘收录了他的134首医方，使后人可以大致得知张文仲的医学特点。

《外台秘要》最早记载了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拨障术”，唐代多位诗人都曾描写过这一由婆罗门僧人施行的外来手术疗法。书中还有一些内容出自《高丽老师方》《天竺经论眼》，这两种著作也已失传。可见《外台秘要》见证着唐朝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季羡林先生指出，在孙思邈《千金方》中关于印度眼科知识的记载比较少，而《外台秘要》中关于印度眼科知识的记载却比较多，由此判断印度眼科知识传入我国的主要时期是在盛唐时期。

王焘在《外台秘要》自序中说“古所未有，今并缮辑”，书中一些没有标明出处的医方，不少是他依托家世与官位之便，不断积累收集而来的，反映着最新的实践知识。

全面深入的医学成就

《外台秘要》全面展现了盛唐时期的医学成就，有很多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如《外台秘要》多次引用东汉末名医张仲景的医方，其中一些条文未见于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说明王焘在宫中曾经见到更接近《伤寒杂病论》早期面貌的珍本。这些条文对研究

《伤寒论》很有价值。此外书中还首次专篇论述了温病、天行（指发热性传染病）的证治和方药，应用了辛凉清热、养阴清热等治法，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丰富的论治经验，成为明清温病学说创立的先声。

《外台秘要》对一些疾病的典型特征记载准确且细致，如引用隋唐间医学大家甄立言《古今录验方》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消渴病相当于现代的糖尿病，这是医学文献中消渴病尿甜的最早记载。

《外台秘要》不收录针法，但很重视经络穴位。唐以前的经穴图多分人体正面、侧面和背面三幅绘制，《外台秘要》首次记载了按十二经分别绘图的做法，同时依据唐初针灸名医甄权、杨操等人的理论和经验，记载各经脉上的孔穴的主治作用比前人更加详细。

《外台秘要》最早记载了对于黄疸病情进退的实验观察法，“每夜小便中浸帛片，取色退为验”，其原理相当于现代实验检测的比色法。

以上所述，仅可略窥《外台秘要》价值之一斑。王焘“捐众贤之砂砾，撮群才之翠羽”著成此书，将“兰台”中的珍秘要方呈现于世，许多古代文献赖此而保存，盛唐时期的医学知识也得以整理和光大，故《新唐书》称该书“讨绎精明，世宝焉”。此书在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经校正医书局校正刊行，后世多次翻刻，并流传于国外，是我国古典医籍中的瑰宝。



蓉城品茶知古今

□ 赵汝周

茶文化，是一种休闲文化，包括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艺、茶具、茶画、茶学、茶故事、茶艺，等等，反映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礼仪。品茶是对生活的享受，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慢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品茶能让人们的心绪归于平静、远离喧嚣。

茶文化始于中国。中国饮茶，源于四川。而四川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是成都新津。唐宋时期，成都是全国茶叶生产的主要地区，也是茶叶贸易的集散中心。清代以来，成都的茶馆文化别具一格，相沿至今。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巴蜀地区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茶的饮用习俗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古巴蜀一带，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自秦人取蜀后，始知有茗饮之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巴蜀一带，巴蜀的茶和饮茶的文化也向中原传播。茶有不同的名称，并且大多数来源于古巴蜀地区的方言，唐玄宗时官修《开元文字音义》，“茶”才正式定名。西汉时期饮茶活动在巴蜀一带非常盛行，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在家作的劳役工作中，就包括“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可见，汉代四川一带不仅已开始饮茶，而且出现了“武阳”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当

时，成都不但已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也是茶叶集散中心。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禅茶一味”。“禅茶一味”这四个字足以形象地说明禅与茶的关系，坐禅和品茶是一个道理，都可以静心修身。“禅茶一味”是在宋代由成都郫县人、成都昭觉寺住持圆悟克勤禅师提出的，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正是在圆悟克勤的影响下，悟出“茶禅一味”的真谛。当年，昭觉寺圆悟克勤禅师的师父、绵竹人五祖法演曾在成都大慈寺学习，对大慈寺历代相传的茶礼颇有体会。他离开大慈寺到湖北省黄梅县五祖山讲禅，向同门师弟刘元甫讲述大慈寺的茶礼，刘元甫以此写了一本《茶道清规》，提出了“和、敬、清、寂”的饮茶理论。

茶文化的特点。盖碗茶是成都茶文化主流。成都特有的矮桌竹椅和茶碗、茶盖、茶船子的茶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茶馆、茶肆在蜀中更是历史悠久，遍布巴蜀城乡和街巷，极富特色，或隐于闹市，或立于郊野，置身其中，不但可以品茗养性，还可以听评书、看国鼓，充分体味巴蜀的风土人情。现在要想领略老成都茶馆的味道就必须到公园河边的茶

铺，那里人多、风景好，河水、大树、茶座、小吃一应俱全，品茶、看水、聊人生。

“泡”字是成都茶文化的灵魂。在成都的茶馆里，人们的坐功可以自然的增长，所以“泡”字就成了茶馆的灵魂。现在茶馆里的内容和故事尽管没有上个世纪那么丰富，也还是很有味道的。正所谓“杯里乾坤大，茶中日月长”，小茶馆大社会，容留南来北往之风。茶馆的人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自有雅俗共赏之意。生意人在此谈生意，退休者在此忆往昔，朋友们在此叙旧情，恋人们在此诉情怀，家人们在此享温馨。一杯清茶坐半天，甚至一整天，茶铺也是笑脸伺候，你随时可以大声吆喝“掺茶”，“来了”……茶盖谓天，茶船谓地，茶杯喻人，茶水冲上，盖于一盖，意思就是天地人和。

茶博士是成都茶文化的亮点。成都茶文化最有特色的就是茶博士，其实就是掺茶跑堂的。成都茶馆掺茶技艺高超，还有许多绝活。他们摆茶船、放茶碗的动作一气呵成，可以把装满开水，有一米长壶嘴的大铜壶玩得风车斗转。他是先把壶嘴靠拢茶碗，然后猛地向上抬拍，一股滚水像直泻而下的小柱冲上茶碗里，然后再他伸手过来小拇指一翻就把你面前的茶碗盖起了，那手法硬是叫绝。他们表演的花样有“苏秦背剑”“蛟龙探海”“飞天仙女”“童子拜观音”等，让人眼花缭乱。技术高超的可以扭转身子把开水注到距离壶嘴几尺远

的水瓶里，刚好灌满，外面点滴不留，和古文里那个卖油翁的技术不相上下。他们生活在茶馆，接触社会各阶层，见闻广博，知识面广。城市里的道路交通、新闻轶事他们全部知晓，因此被茶客呼为“茶博士”。

“民俗”是成都茶文化底色。成都茶馆的格局和气氛与其他地方的茶馆比较很有差别，这里的茶馆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一个“俗”字，不是庸俗，是通俗，是民俗，是俗的安逸。竹制的扶手椅完全符合人的关节延伸，但是又不像沙发或躺椅那么会使人昏昏欲睡，而是让你舒适得待上一整天也不疲倦。就是那竹椅本身，也是成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热闹是成都茶文化的本色。成都的茶馆热闹非凡，卖瓜子、卖花生、擦皮鞋、舒筋骨、谈生意、闲聊睡、写文章，百业千行都对茶铺情有独钟。成都人偏要挤到一起去茶馆里找感觉，道遥派头可见一斑。

如今，外国人到成都旅游时，也喜欢到街边的茶馆去体验成都的茶文化，感受成都的乡土人情和世间民俗。



教育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是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是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案，是对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进一步升华，为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指明了方向，意义重大。

教育评价要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用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引领教育发展，就是要围绕立德树人，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出发，使教育评价更加关注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品德发展、学业发展，科学开展过程性、综合性、多元性的评价，切实扭转单纯以考试分数成绩衡量学生发展、以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的倾向。此前，教育系统已经开始探索部分教育评价改革与实验，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小生素综合素质评价等。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近两年，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开展了清理不科学教育评价导向的专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五唯”倾向。有破无立，只破不立，不建立相应的科学的评价体制和机制，必然出现“评价真空”。只有破立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教育评价作为指挥棒的积极作用，为立德树人创造良好环境和氛围，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总体方案》的通过，对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教育评价需要总体谋划和系统设计

教育涉及学校、教师、学生等方方面面，是相互制约、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教育评价也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总体协调、统筹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五唯”问题。《总体方案》提出，从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分层分类研究提出改革的思路举措，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指出了教育评价改革的大逻辑，从总体上对教育领域评价改革进行了系统设计，是从根本上谋划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过引导、调整、优化的“指挥棒”功能，用科学的教育评价指挥、引导、规范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育评价需要改革政绩考核指挥棒，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科学的教育政绩观，优化教育生态，从根本上建立起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机制。改革学校评价指挥棒，引导学校形成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好学校”评价观。改革教师评价指挥棒，引导学校建立坚持师德伦理、潜心教书育人、助力全体学生尤其后进生全面发展的“好教师”评价观。改革学生评价，坚决摒弃“考考考，学校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评价方式，引导学生和家长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观。

教育评价改革要重落实和推进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提出了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式和主要任务，抓住了教育评价改革的核

改革教育评价为教育把好舵

□ 王 蕊 许海霞

心问题，提供了具体目标和行动路径。改进结果评价，破除的是单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硬性指标”的简单做法，而非完全摒弃“五”类硬性指标，应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挖掘硬性指标之外的“软指标”，从一元到多元。强化过程评价，应从“一考定终身”的终结性评价转向重视教育教学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充分发挥过程评价的诊断功能，及时对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进行诊断反馈，及时对教育目标进行调整，及时对教育决策提供参考，最终为教育及学生发展保驾护航。探索增值评价，改变重终点轻起点轻过程、重选拔轻培养的倾向；优先关注教育过程和学生发展，着眼于学生、教师、学校和地区的教育进步幅度和努力程度，在此基础上对教师教学、学校管理、政府治理有针对性地提出反馈，全面提升教育公平和质量。健全综合评价，重在多元，即评价内容上，全方位考察考试成绩、综合考核结果以及综合素质评定；评价方法上，应以教育评价理论和技术创新为重点，促进教育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主体上，坚持政府、学校、教师、同行、第三方多方参与，探索建立政府元评估、学校自评、独立第三方执行评价、国际参与和民众监督的多元化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是国之大计，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教育评价就要回归教育的本质、回归教育的规律、回归教育的初心，一方面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做好贯彻落实，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更新教育观和人才观，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只有上下同心、社会合力，才能从根本实现改革目标。

